

# 中国经济转型期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研究 ——兼论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效果

吴俊,康继军,张宗益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基于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理论阐释,采用市场化指数来刻画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过程,文章对中国经济转型期(1991~2005年)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讨论了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变动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在提高资本金占比的同时会增加高风险资产的占比,资本提高对银行风险行为有明显的逆向激励作用;(2)市场化指数与商业银行资本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强化商业银行对风险的追逐行为;(3)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的提高没有明显作用。

**关键词:**转型经济;市场化指数;银行行为;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1-0051-11

## 一、引言

以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为代表的资本充足监管制度已成为各国最重要的银行监管制度。自巴塞尔协议制度建立以来,资本监管下银行如何调整其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总量和构成,以及资本监管能否有效地降低银行个体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一直是理论与监管实践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以在险资本效应假说(Furlong 和 Keeley, 1989; Keeley 和 Furlong, 1990)为代表的理论分析认为,资本监管将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因此提高商业银行资本要求将有效驱使银行在资产选择中采取谨慎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而以预期收入效应假说(Kahane,

收稿日期:2007-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JL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0525005)和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作者简介:吴俊(1975—),男,重庆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康继军(196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张宗益(1964—),男,贵州松桃人,重大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7; Koehn 和 Santomero, 1980; Kim 和 Santomero, 1988) 为基础的理论分析则认为, 迫使银行增加资本金的资本监管制度将降低银行的期望收入, 基于对预期收益的理性补偿, 银行将增加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以弥补预期收入的下降, 因此银行在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同时, 其资产风险也会相应提高。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资产扩张和风险追求行为存在着重要影响。但由于各国经济制度背景和监管实践的差异, 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商业银行的行为及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Barth, Caprio 和 Levine, 2004), 学者们对于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Santos, 2001; VanHoose, 2007)。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际统一的银行资本监管框架起源于 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2004 年 6 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新协议 (Basel II): 《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 修订框架》。新协议由最低资本要求、现场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个互补的支柱组成。新协议对风险更为敏感, 资本充足要求仍然是协议的核心。Basel 委员会认为, 充足的资本水平有助于提高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对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水平, 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但研究文献对于资本监管如何影响银行行为和能否有效降低银行风险却一直存在争论, 主要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即提高资本要求对银行行为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预期收入效应会刺激银行追求更高风险, 另一方面在险资本效应迫使银行在投资时采取谨慎行为。

Kahane (1977)、Koehn 和 Santomero (1980)、Kim 和 Santomero (1988) 运用资产组合模型中的均值一方差方法证明, 由于增加资本会降低银行的期望收入水平, 银行将增加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以增加收入, 弥补损失, 因此提高资本要求会增加银行资产风险。资本监管的预期收入效应对银行风险行为具有逆向激励作用。与之相对立, Furlong 和 Keeley (1989)、Keeley 和 Furlong (1990) 运用期权模型证明, 银行资本金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存款保险期权的价值, 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 因此银行会在资产选择时采取谨慎的行为, 从而降低银行的资产风险。资本要求的这种正向激励作用称为在险资本效应。Rochet (1992) 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 提出如果能够根据资产风险 (基于市场的风险) 确定风险权重, 银行会选择低风险资产, 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降低银行风险。Blum (1999) 分析了动态环境中资本充足率管制的跨期效应, 证明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在未来达到资本充足要求, 会在当期增加高风险资产的投资。

由于理论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许多学者转而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巴塞尔协议的微观效应。Shrieves 和 Dahl (1992) 首先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 从

实证的角度分析巴塞尔协议监管下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支持了预期收入效应的理论分析,银行资本和资产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银行提高资本的同时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弱了资本要求的政策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Jacques 和 Nigro(1997)对巴塞尔协议实施初期的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要求能够有效地增加商业银行资本和降低其资产风险。Rime(2001)对瑞士银行业的研究发现,在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监管压力下,无论资本充足程度如何,银行都会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但不会引起银行资产风险的升高。Calem 和 Rob(1999)的研究提出资本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存在 U 型关系,随着银行资本的增加银行风险先降低后增加,当银行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本要求的增加可能致使银行追求更高的风险。Godlewski(2005)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有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没有发现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巴塞尔协议的微观效应。马蔚华(2005)、于立勇和曹凤岐(2005)以在险资本效应假说为理论分析基础,认为我国引入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制度后,资本约束促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有利于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制约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黄宪等人(2005)将 Blum(1999)的跨期模型简化为单期模型,证明了在静态条件下,提高资本要求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吴栋和周建平(2006)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虽然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要求能显著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但对银行资本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在研究框架的设计上,吴栋和周建平(2006)虽然遵循了 Shrieves 和 Dahl(1992)、Jacques 和 Nigro(1997)的研究思路,但没有考虑我国经济转型期市场化进程这一重要的制度背景,忽略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环境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大都采用发达国家银行研究思路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范式,而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进程这一银行业特定环境的实证研究则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将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一特殊且重要的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因素作为环境变量引入研究框架,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行为进行研究。

### 三、研究模型及变量设定

#### (一)研究模型设定

尽管理论研究在资本要求能否有效降低银行资产风险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分析结果都表明商业银行对资本和风险的调整是同时进行的。本文采用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广泛应用的 Shrieves 和 Dahl(1992)联立方程分析框架,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行为。Shrieves 和 Dahl(1992)认为从实

证角度研究银行行为,应该分析银行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分析资本水平与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

银行  $j$  在第  $t$  期资本和风险总的变动分别表示为  $\Delta CAP_{j,t}$  和  $\Delta RISK_{j,t}$ , 即:  $\Delta CAP_{j,t} = CAP_{j,t} - CAP_{j,t-1}$ ,  $\Delta RISK_{j,t} = RISK_{j,t} - RISK_{j,t-1}$ 。银行资本和风险的变动分别由意愿调整和随机变动两部分构成:  $\Delta CAP_{j,t} = \Delta^d CAP_{j,t} + \tilde{E}_{j,t}$ ,  $\Delta RISK_{j,t} = \Delta^d RISK_{j,t} + \tilde{S}_{j,t}$ 。其中,  $\Delta^d CAP_{j,t}$  和  $\Delta^d RISK_{j,t}$  是银行的意愿调整,  $\tilde{E}_{j,t}$  和  $\tilde{S}_{j,t}$  则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随机变动。

根据 Peltzman(1970)和 Marcus(1983)的分析,银行资本的意愿调整是银行资本目标水平和上一期水平之间差额的一部分,风险的意愿调整是银行风险目标水平和上一期水平之间差额的一部分,即:  $\Delta^d CAP = \alpha [CAP_{j,t}^* - CAP_{j,t-1}]$ ,  $\Delta^d RISK_{j,t} = \beta [RISK_{j,t}^* - RISK_{j,t-1}]$ 。  $CAP_{j,t}^*$  和  $RISK_{j,t}^*$  分别为第  $t$  期银行  $j$  资本和风险的目标水平。可以得到:  $\Delta CAP_{j,t} = \alpha [CAP_{j,t}^* - CAP_{j,t-1}] + E_{j,t}$ ,  $\Delta RISK_{j,t} = \beta [RISK_{j,t}^* - RISK_{j,t-1}] + S_{j,t}$ 。

商业银行除了根据资本和风险的目标水平与前期水平的差额调整当期的资本和风险水平外,银行规模、盈利水平、监管要求和资产质量等因素也会影响银行的调整行为(Shrieves 和 Dahl, 1992; Jacques 和 Nigro, 1997; Godlewski, 2005)。

研究模型如下:

$$\Delta CAP_{j,t} = a_0 + a_1 \Delta RISK_{j,t} + a_2 SIZE_{j,t} + a_3 ROAA_{j,t} + a_4 BASEL_t + a_5 CAP_{j,t-1} + a_6 MARKET_t + u_{j,t} \quad (1)$$

$$\Delta RISK_{j,t} = b_0 + b_1 \Delta CAP_{j,t} + b_2 SIZE_{j,t} + b_3 LLRL_{j,t} + b_4 RISK_{j,t-1} + b_5 MARKET_t + v_{j,t} \quad (2)$$

## (二)研究变量的选取说明

1. 资本行为( $\Delta CAP$ )。在实证研究中,最早采用账面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银行资本的指标,后来普遍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采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银行资本水平。由于我国银行资本来源较为单一,长期以来都以权益资本作为资本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本研究中仍然沿用 Shrieves 和 Dahl(1992)的方法,采用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银行资本(CAP)的指标,用资本(CAP)的一阶差分  $\Delta CAP$  表示资本的变动行为。理论研究表明,银行的资本和风险决策相互影响,银行资本和风险行为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将资本的变动行为  $\Delta CAP_{j,t}$  作为风险方程的解释变量,检验资本变动对资本风险变动的的影响及影响方向;将风险的行为  $\Delta RISK_{j,t}$  作为资本方程的解释变量,检验资产风险变动对资本变动的的影响。

2. 风险行为( $\Delta RISK$ )。本研究中的风险指标主要反映银行对利润和风险的追求行为。国外研究文献主要采用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银

行风险的衡量指标,部分文献采用资产中不良贷款的占比作为风险指标。我们认为,风险加权资产占比是银行风险的事前指标,而不良资产占比是对银行风险的事后测度,因此风险加权资产占比是对银行风险行为的有效度量。在研究中,我们也尝试采用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风险指标,但由于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并未公布其风险加权资产数据,能够获得的数据非常少。本文在获取商业银行资产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率管理办法》所对应的风险权重对各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风险加权资产=同业往来 $\times 20\%$ +贷款 $\times 100\%$ +固定资产 $\times 100\%$ 。在本研究中采用计算得到的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RISK),反映银行对风险和利润的追求行为,用银行风险(RISK)的一阶差分 $\Delta RISK$ 表示风险的变动。

3. 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要求(BASEL)。研究表明,监管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在不同的国家对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变动的的影响不同。国外的研究以银行资本是否达到监管要求的虚拟变量来说明银行是否受到资本约束,或者以银行资本比率与最低监管要求之差来衡量银行受到监管压力的大小。在2004年以前,我国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规定对资产风险的衡量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本研究只在资本方程中考察资本监管要求对资本变动的的影响,以1995年《商业银行法》的实施为标志建立虚拟变量(BASEL)表示是否有资本监管要求,1995年以前为0,1995年起为1。

4. 制度变量(MARKET)。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促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行政计划对经济的干预逐步退出或减少,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的比重逐渐提高,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政府逐步放松了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管制,带来了银行业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银行业市场竞争,强化银行对利润、收入等经营绩效指标的重视,从而刺激银行通过提高风险资产的投入占比,增加自身收益。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市场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等相关信息的披露,这种市场约束迫使银行重视提高资本充足程度和调整风险资产的分布,影响银行资本与风险的调整行为(李雪莲、李永辉,2003)。我们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这4个方面入手,即政府的职能身份转换和从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退出,推动经济的非国有化,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培育产品市场,以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即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成、数据来源及相关计算处理过程详见《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2007)一文,本文更新并补充计算了2004年和2005年市场化指数(见表1)。

表 1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指数(1991~2005)

年份	市场化指数	年份	市场化指数	年份	市场化指数
1991	4.82	1996	7.30	2001	8.18
1992	6.09	1997	7.89	2002	7.99
1993	6.66	1998	7.74	2003	8.20
1994	7.10	1999	7.37	2004	8.67
1995	7.13	2000	7.86	2005	9.35

5. 资本与风险的滞后项。从理论上讲,银行根据上一期资本在当期对资本进行调整,上期资本较低的银行会增加本期资本,因此  $CAP_{j,t-1}$  系数预期为负。同样,银行根据上一期风险在当期对风险进行调整,上期风险较高的银行会在本期降低资产风险,因此  $RISK_{j,t-1}$  系数预期为负。

6. 其他变量。在研究模型中,我们沿用 Shrieves 和 Dahl(1992)、Jacques 和 Nigro(1997)、吴栋和周建平(2006)等文献的研究方法,选择其影响变量。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银行规模(SIZE),以平均资产收益率(ROAA)代表银行当期盈利水平作为资本方程的解释变量,以贷款损失储备与贷款总额的价值(LLRL)代表资产质量作为风险方程的解释变量。

####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样本特征和数据来源。本文以目前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期为 1991~2005 年,由于各商业银行成立时间和年报数据披露时间不同,各银行样本数量不完全一致。经差分 and 取滞后项等数据处理后,样本总数为 165 个,在样本的覆盖范围和期限上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Bankscope 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年报。

(二)研究方法及回归结果。在联立方程组的系统估计方法中,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同时,GMM 方法不需要知道扰动项的确切分布,GMM 估计量是非常稳健的(高铁梅,2006)。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联立模型实证结果

变 量	GMM 回归结果		去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结果	
	$\Delta CAP_{j,t}$	$\Delta RISK_{j,t}$	$\Delta CAP_{j,t}$	$\Delta RISK_{j,t}$
C	0.641 (1.788)	0.232*** (0.043)	-0.844 (1.178)	0.239*** (0.042)
$\Delta RISK_{j,t}$	7.265* (4.576)		7.155* (4.172)	
$\Delta CAP_{j,t}$		0.045** (0.021)		0.046** (0.020)
$SIZE_{j,t}$	0.182** (0.084)	-0.019*** (0.006)	0.159** (0.082)	-0.019*** (0.006)
$ROAA_{j,t}$	1.093*** (0.218)		1.079*** (0.212)	

续表 2 联立模型实证结果

变 量	GMM 回归结果		去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结果	
	$\Delta CAP_{j,t}$	$\Delta RISK_{j,t}$	$\Delta CAP_{j,t}$	$\Delta RISK_{j,t}$
BASEL <sub>j,t</sub>	0.261 (0.417)			
LLRL <sub>j,t</sub>		-0.258** (0.111)		-0.255** (0.112)
MARKET <sub>t</sub>	-0.255 (0.228)	0.018*** (0.004)		0.017*** (0.004)
CAP <sub>j,t-1</sub>	-0.461*** (0.046)		-0.435*** (0.058)	
RISK <sub>j,t-1</sub>		-0.384*** (0.046)		-0.384*** (0.046)
R <sup>2</sup>	0.443	0.319	0.441	0.317
Adjusted R <sup>2</sup>	0.442	0.297	0.427	0.295
D-W	2.078	1.842	2.038	1.838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1. 资本与风险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风险方程中, 资本的变动  $\Delta CAP$  的系数大于零, 并且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银行资本与风险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结论与 Shrieves 和 Dahl (1992)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我们的研究样本期间, 银行资本的变动对风险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预期收入效应的理论分析一致, 提高商业银行资本要求引起商业银行对未来收益水平下降的预期, 商业银行会增加对高风险资产的投入以弥补期望收入的损失。我国政府曾经多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动用外汇储备等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 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 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但是由于银行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不良资产的迅速增加, 致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迅速下降。研究结果表明, 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提高银行资本充足水平, 并不能保证我国商业银行显著地改善风险追求的行为取向。

在资本方程中, 风险的变动  $\Delta RISK$  的系数大于零, 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证明银行风险的变动对资本的变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银行希望通过增加预期收益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从而偏好较高风险的投资。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间, 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长期偏低并偏重发展风险较高的公司业务。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由这一现实情况得到印证。

2. 由于资本监管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巴塞尔协议的引入对银行资本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监管要求变量 BASEL 的系数为正, 说明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要求有利于银行资本充足程度的提高。但是, 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明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对银行的约束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于 2004 年 3 月颁布实施的。在此之前, 虽然 1995 年《商业银行法》和 1996 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

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原则上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以及相应的计算方法,但是实践中在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对于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措施,资本充足率监管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监管当局在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上选择了监管宽容,在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上存在软约束(孙健夫、王海燕,1997)。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较为单一、盈利水平较低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缺少提高资本充足程度的约束和激励,导致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张丽华,2004)。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特殊性,资本不足的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吴栋、周建平,2006),决定了监管当局不能完全遵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而应当采取限制经营业务领域、征收较高的存款保险费,或者关闭以及被其他银行兼并等严厉的惩罚措施。我们的研究结论与资本充足要求在实践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的现状是相符的。

3.经济转型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的风险行为,但对资本变动没有显著影响。在风险方程中,市场化相对指数(MARKET)对银行风险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在资本方程中市场化指数的银行资本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转型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增加银行的风险行为,对银行资本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

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银行业也在推进商业化改革和产权制度变革,商业银行逐渐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银行的自主信贷能力增强。由于收益最大化的驱使,银行更加重视利润和收益等绩效指标,通过扩大资产规模和提高贷款等盈利资产的占比,达到提高收益的目的(高洪星、杨大勇,2000);同时由于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银行业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逐渐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促使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充分,表现为银行对高风险资产的追求。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虽然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从1995年起引入了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监管要求,但由于资本充足要求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同时,作为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基础,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约束对于激励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限制其风险行为的机制尚未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市场化程度与商业银行资本的变动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

4.银行根据上一期资本与风险反向调整其资本和风险。上一期资本水平 $CAP_{j,t-1}$ 与资本变动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一期资产风险水平 $RISK_{j,t-1}$ 与风险变动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CAP_{j,t-1}$ 的系数为负说明上一期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在本期会增加其资本充足率水平; $RISK_{j,t-1}$ 系数为负则说明上一期资产风险较高的银行,在本期会降低其资产风险。研究结论表明银行会

根据资本和风险的目标水平与前一期水平的差距做调整,尽量趋近理想的资本和风险水平。

5. 银行规模有助于增加资本和规避风险。在资本方程中,银行规模(SIZE)对资本变动的影响为正,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表明,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更容易获得调整资本的资金。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较大的银行,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有利于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资本充足水平。因此在现实的监管实践中,国有商业银行更容易得到来自于政府的资本金补充。

在风险方程中,银行规模对风险增加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银行规模有利于资产风险的分散,同时也反映了国有银行的行为更为谨慎。从理论上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比较健全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在资产的投资上应该更为谨慎。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股东对更高的收益期望会进一步表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利润和风险的追求。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轨时期,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往往在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考核也更偏重安全性,致使国有银行在资金的使用上表现出对资金安全的重视,甚至出现“惜贷”的情况。

6. 银行收益有益于资本金的补充。盈利水平 ROAA 对资本的变动也有正向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银行提高资本。这表明经营收益是现阶段我们资本金补充的重要途径,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尤其是核心资本充足水平。

7. 贷款损失的增加迫使银行调整投资行为。在风险方程中,贷款损失 LLRL 的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贷款损失的增加,迫使银行对投资行为进行调整,降低高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以避免未来更为严重的损失。

## 五、结 论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我国主要商业银行 1991~2005 年数据,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和 risk 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资本与 risk 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资本金占比的提高同时伴随着资产 risk 的上升,提高资本水平对银行 risk 行为的逆向激励作用显著,仅仅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监管措施并不能完全降低银行资产 risk;(2)在资本充足监管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巴塞尔协议的引入对于商业银行资本的提髙没有显著影响;(3)由于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剧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迫使银行追求更高的收益,表现为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的风险追求行为更为明显。

在近年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中,由于国家大量补充资本金

和剥离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不良资产快速下降。但银行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资产质量的改善,并非源于资本监管的政策影响,银行缺少提高资本的内在激励和降低风险的约束机制。由于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地执行监管要求,监管当局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惩罚措施,资本充足监管对银行的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对资本充足率应有的关注,仍然存在盲目扩张和追求风险收益的内在冲动,导致部分银行在补充资本金后又迅速出现资本充足率偏低、不良资产剥离后不良贷款又反复上升的现象。研究表明,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实施效果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单单依靠补充资本金这一途径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并不能改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追求的行为取向和有效降低商业银行资产风险。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和要求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真正发挥其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达到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降低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Barth J R, G Caprio, R Levine.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What works best?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4,13:205~248.
- [2]Blum J. Do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reduce risks in banking?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9,23:755~771.
- [3]Calem P S, R Rob. The impact of capital-based regulation on bank risk-tak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1999,8:317~352.
- [4]Furlong F T, M C Keeley. 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risk-taking: A note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9,13:883~891.
- [5]Godlewski C J. Capital regulation and credit risk tak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ank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s [J]. Journal of Banking Regulation,2005,6:128~145.
- [6]Jacques K, P Nigro. Risk-based capital, portfolio risk, and bank capital: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97,49:533~547.
- [7]Kahane Y. Capital adequacy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7,1:207~218.
- [8]Keeley M C, F T Furlong. A reexamination of mean-variance analysis of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0,14:69~84.
- [9]Kim D, A M Santomero. Risk in ban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 43:1219~1233.
- [10]Koehn M, A M Santomero. Regulation of bank capital and portfolio risk [J]. Journal of Finance,1980,35:1235~1244.
- [11]Marcus A J. The bank capital decision: A time 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e,1983,38:1217~1232.
- [12]Peltzman S. Capital invest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rtfolio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1~26.

- [13] Rime B.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u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witzerland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1, 25: 789~805.
- [14] Shrieves R, D Dah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2, 16: 439~457.
- [15] 高洪星, 杨大勇. 经济转型期不良贷款与政策性贷款研究[J]. *财贸经济*, 2000, (10): 32~35.
- [16]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7] 黄宪, 马理, 代军勋.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J]. *金融研究*, 2005, (7): 95~103.
- [18] 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J]. *管理世界*, 2007, (1): 7~17.
- [19] 李雪莲, 李永辉. 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分析[J]. *财经研究*, 2003, (5): 8~14.
- [20] 马蔚华. 战略调整: 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路径选择[J]. *经济学家*, 2005, (1): 44~50.
- [21] 吴栋, 周建平. 资本要求和商业银行行为: 中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6, (8): 144~153.
- [22] 于立勇, 曹凤岐. 论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资本率水平[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1): 30~37.
- [23] 张丽华.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现状及提高比率的路径选择[J]. *金融研究*, 2004, (10): 69~76.

## **Banks' Capitalization and Risk-taking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s of Basel Accord in China**

WU Jun, KANG Ji-jun, ZHANG Zong-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ing capital and risk adjusting behaviors in China transitional economy unde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 employing the marketization index for institution changing and the data from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pital adjustments positively associate with risk changes, and increasing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isk-taking; the marketization course intensifies the banking competition, which increases banks' risk-taking; the Basel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have no substantial impacts on capital adjustments, for the requirements are not implemented stringently.

**Key words:** transitional economy; marketization index, bank behavior; Basel accord; capital regulation

(责任编辑 喜 雯)